

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保障储备粮食安全

■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事务服务中心(辽宁省粮食检验检测中心) 路峰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储备粮作为政府调控市场、应对突发事件的物质基础,其质量状况不仅关系到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安全,也影响着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储备粮规模保持较高水平,储存周期较长,质量安全管理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的以环节分割、职能分治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模式,由于缺乏全过程的贯通和信息的共享,逐渐暴露出风险识别滞后、责任追溯困难、管控措施碎片化等突出问题。构建从田间到储备、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实现储备粮质量安全的全程可防、可控、可追溯,已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管理能力建设的核心任务。

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储备粮质量形成与演变规律的深刻把握。粮食作为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有机体,其质量性状在收获后的整个流通和储存过程中持续产生物理、化学和生物层面的变化。从产地环境对粮食初始品质的决定性影响,到收购运输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和污染风险,再到储存期间因温度、湿度、气体成分和虫霉活动导致的品质劣变,以及轮换出库后的终端消费安全,每一个环节的质量状况都是上一个环节状态的延续和下一个环节安全的基础。这种质量影响的传递性和累积效应,要求质量管控必须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惯性思维,建立覆盖全

流程、衔接全环节的系统化治理框架。

在收购环节,质量管控的重心在于源头把关和风险识别。粮食入库时的初始质量直接决定了其后期的储存品质和食用安全性。这一环节需要建立严格的入库检验制度,对所有拟入库的粮食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质量标准 and 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全面检测。入库检验不仅包括容重、水分、杂质、不完善粒等常规质量指标,还应涵盖重金属含量、真菌毒素污染、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指标。只有各项指标均符合储备粮质量要求的粮食,方可准予入库。与此同时,收购环节还应加强与产地信息的对接,了解粮食产区的土壤环境质量、气候条件、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等,从源头上预判和防范质量风险,避免受污染粮食进入储备体系。

储存环节的质量管控是全链条中最具时间跨度和技术难度的一环。粮食在储存过程中,受自身呼吸代谢活动、环境温湿度变化、仓虫和微生物活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品质会逐步发生变化。储存品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脂肪酸值、过氧化值、酸价、黏度、色泽气味等的改变,严重时可能出现霉变、酸败等不可逆的劣变。因此,储存环节的质量管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在仓储设施方

面,应积极推广应用低温准低温储粮、气调储粮、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通过精准调控仓内温湿度和气体成分,创造不利于害虫和霉菌生长繁殖的储存环境,延缓粮食品质劣变速度。在质量监测方面,需要建立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库存质量抽检制度,对在库粮食的储存品质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异常粮情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此外,储存环节还应加强粮情测控系统建设,利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联网设备,实现粮情的实时监测和自动预警,将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防控。

轮换和出库环节是质量管控的终端节点,也是储备粮从政策属性向商品属性转换的关口。轮换出库的粮食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确保其符合相应的用途标准,流向加工或销售环节的粮食必须满足食品安全要求。对于达到储存年限或品质已明显下降的粮食,应在轮换计划中优先安排出库,避免超期储存带来的质量风险。出库检验报告应随货同行,实现质量信息的完整传递和责任可追溯。同时,轮换过程中的质量数据与入库初始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为评估不同储存条件下的品质变化规律提供依据,进而指导储存方案的优化。

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规范和信息技术的双重支撑。在制度层面,需要健全储备粮质量管理的法规标准体系,明确各环节的质量责任主体和检验要求,建立质量档案管理和追溯管理制度。在信息化层面,应推动建设覆盖全链条的储备粮质量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从收购、入库、储存、轮到出库各环节质量数据的电子化录入、自动化汇总和跨层级共享。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上级管理部门可以实时掌握各库点的质量状况,基层库点可以方便地查询粮食的质量历史和处置记录,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追溯码查询储备粮的来源和质量信息。

可见,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当前在一些地区和库点,收购检验能力不足、储存监测手段落后、信息记录不完整等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环节的质量数据尚未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这些都制约着全链条管控的整体效能。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质检能力建设的投入,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强化各环节质量责任的刚性约束,推动储备粮质量管理从分段管控向全链条闭环、从经验管理向数据驱动逐步转变,切实筑牢储备粮食安全的质量防线。

弘扬长征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场景空间研究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崔雨微

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承需依托具象化的物质载体与沉浸式场景空间。本文从文化记忆视角出发,梳理长征遗址遗迹、纪念馆、革命文物等物质载体类型,分析沉浸式体验、数字虚拟空间、红色旅游融合等场景营造策略,揭示“物、场、人”协同的精神传承机制。新时代应借助科技与艺术手段,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框架下,让载体“说话”、场景“升温”,实现长征精神从历史记忆向实践行动的创造性转化。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蕴含坚定理想、不畏艰难、实事求是、团结民众等丰富内涵。然而,亲历者渐逝、信息传播碎片化,使年轻一代对长征的认知趋于抽象。如何让长征精神可感可知,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关键。这需借助可见可触的物质载体与可进入的场景空间——它们既是历史物证,也是精神容器,通过空间叙事唤醒集体记忆、激发情感认同。

一、物质载体与场景空间的内涵

物质载体指凝结长征历史信息的实体存在,分三个层次:原始遗物遗迹(武器、文书、会议旧址等)、后人修建的纪念建筑(纪念碑、纪念馆等)、被赋予长征叙事的地理线路(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物质载体具有双重属性,即

历史实证与精神锚点。但静默载体需在特定叙事中激活,这就引入了场景空间——由物质要素、技术媒介、人的活动共同构成的体验环境。场景空间弥补传统展陈的距离感,使受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从“知道”升华为“感受”。

二、物质载体的类型与功能

遗址遗迹的原真性保护。长征沿线留下于都渡口、遵义会址、泸定桥、夹金山、会宁会师楼等大量遗址。原真性赋予其不可替代的感召力,立于泸定桥上便能切身理解飞夺天险的壮烈。当前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修缮保护,并辅以情景还原(如于都河复制浮桥与送别雕塑),延续历史氛围。

纪念馆的叙事性空间。纪念馆具有叙事整合力,通过空间序列编排精神史诗。如某馆以“突围、转折、磨难、信仰、胜利”为暗线,空间由压迫到开阔再到严寒模拟,最后抵达光明会师厅,光线、色彩、声音构成叙事语法,引导观者经历心灵洗礼,使精神不再是展板铅字。

革命文物的符号化运用。单件文物如草鞋、半条被子、马灯,往往蕴含着很多故事。文

物还通过雕塑、绘画、影视转化为精神图腾,并衍生于文创、数字藏品,渗透日常生活。

三、场景空间的营造策略

沉浸式场景重塑。“重走长征路”从徒步怀旧发展为多维情境设计,设置负重穿越、敌机侦察、断粮互助等模拟环节,配合特型演员互动,使身体压力转化为精神体悟。固定场景中的沉浸式剧场采用环幕、动态座椅、风雾雪特效,还原雪山暴风雨,多通道感官刺激让年轻一代瞬间代入。

数字虚拟空间拓展。VR让体验者“站”在泸定桥头直面弹雨;AR在普通教室呈现虚拟红军队伍。更前沿的是“数字长征”平台,高精度三维建模构建数字孪生世界,用户化身角色重走全程,与AI历史人物对话、完成任务、积累“信仰值”。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已上线,数字化场景纳入国家文化记忆基础设施。

红色旅游与生活场景融合。长征沿线特色小镇将红色记忆与民宿、餐饮结合,打造“吃红军饭、走长征道”复合场景;城市地铁、校园微体验区将长征元素嵌入公共空间与体育课,使精神浸润日常休闲与学习,实现“可游、可居、可感”。

四、物质载体与场景空间的协同机制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思想困境及精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探析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颖

二、精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构建路径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思想困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构建科学合理的精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一)建立精准画像机制,实现分群体施策

精准思政的实施必须精准识别。应结合行业、区域和岗位特点做好新就业群体画像,区分快递、网约配送、驾驶、直播等不同工作场景,摸清不同群体的关注重点和信息接收习惯,改变统一、程序化的工作方式,转向分群体、场景化的内容输出,有针对性地推送高质量的学习内容。

(二)创新“指尖阵地”机制,推动教育方式数字化转型

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性强,是破解新业态劳动者思政引领难题的重要抓手。应依托微信、抖音、社群等新媒体指尖阵地,打造“指尖课堂”,开发系列微视频、情景剧、微信公众号图文解读等,用生动鲜活的语言和案例解读理论政策。充分利用“学习强国”“智慧党建”等网络学习平台以及手机接单平台,组织新就业群体开展常态化线上学习。

(三)完善组织覆盖机制,夯实思政工作根基

应突破传统单位制党建的路径依赖,探索

按区域、社区、平台、职业类型建立灵活的功能型党组织,“云上”建支部,将党组织有效嵌入平台企业、配送站点、直播基地。依托社区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成立社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将辖区内分散的新就业群体党员统一纳入管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实效。

(四)建立激励引导机制,增强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同

树立行业榜样典型、宣传身边先进事迹,搭建参与基层治理、展示自我价值的平台,积极挖掘推荐新就业群体先进典型人选,开展特色典型选树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激发的责任感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把思想引领力有效转化为社会治理力,引导新就业群体把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不断增强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群体,面对这一群体规模庞大、构成复杂、思想多元的现实,必须摒弃传统“一刀切”的工作思维,构建以精准画像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服务融合为路径、以组织覆盖为保障的精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把这一“活跃的地带”转化为“坚强的阵地”,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这一群体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各种思想困境,构建精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应当“着眼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结合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和群团工作,构建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扩大覆盖,精准施策”,为解决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思想困惑提供指引。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思想困境

(一)职业认同感偏低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首要思想困境是职业认同感的普遍偏低。多数货车司机、网约配送员等从业者仍面临职业价值感偏低的困境。传统行业劳动者拥有较为健全的工会组织和以职业或单位为核心的组织共同体,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在劳动过程中呈现分散状态,难以形成群体归属感。

(二)对传统教育模式接受度不高

传统的“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效果有限。这一群体思想活跃、流动性强,组织形态、劳动关系、工作方式与传统业态从业者相比具有许多新特